



宁夏位于我国西北东部,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早在三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秦汉时期,宁夏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线的重要节点。欧亚商旅往来不绝,各种文化形态交汇融合,同生共长,形成了既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又有着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传统。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文学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成为我国文学版图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块。

宁夏当代文学的萌芽与新中国同步,而宁夏文学的兴起完全与改革开放同步。

1978年冬季某一天,张贤亮从农场收工回来,在自己的小土坯房里用过晚餐后,趴在炕板上,用借来的蘸水钢笔,在学生作文用稿纸上写下了一行标题:《四封信》。当书写这三个字的时候,张贤亮脑海里回响着积攒了20多年苦难结晶般的声音:在中国,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联,不可分割。

这是张贤亮第一部短篇小说,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创作出了十几部短篇、系列中篇“唯物论者的启示录”、数部长篇以及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加入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这一新生事物鼓鼓且呼。张贤亮声称,自发表作品以来,他从未满足于只做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小说家,而是把文学当成参与社会变革的一项活动;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证明了:不改革,便没有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张贤亮后来多次充满深情地说,在过去艰难的岁月里,正是依靠劳动人民的温情,才使自己保持了生的希望。时至今日,许灵均、李秀芝、章永璘、马缨花、海喜喜、黄香久等一系列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闪烁着奇异光彩的形象,他们在历史中存在着、见证着。

强烈的祖国意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念以及对苦难的书写,正是张贤亮留给当代宁夏文学的一笔珍宝。1996年,小说家南台出版了长篇小说《一朝县令》,延续了张贤亮作品中的改革主题:苦泉县,宁夏南部地区一个闭塞、落后、沉闷的小县城,依稀感受到了源自京华的改革大潮,死水微澜,其下是改革与保守势力的较量。作者曾亲口对我说,小说原名《在铲除了玫瑰花的土地上》,此刻虽春寒料峭,瑟瑟发抖的嫩叶毕竟感应到了无可阻挡的春天气息。张贤亮评价道,南台质朴、传统的叙事形式中是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的,并且内含一种批判锋芒。与此同时,油画专业出身、亦具文学天赋的马知遥,还在一家电影放映公司当美工,默默无闻,是张贤亮发现了他的才华并鼓励其成为专业作家。感激于老友的提携,马知遥以数十年之力完成长篇小说《亚瑟爷和他的家族》。仿佛是为着呼应张贤亮,小说用写实和幽默风格叙述了一个回族旧家族数百年间的苦难史,以之为载体,寄寓了一种紧迫的变革意识,用嘶哑的声音执著地诉说着、吟唱着爱国主题。查舜中篇小说《月照梨花湾》

世界上诗人可分两类,一类是内向的诗人,另一类是外向的诗人,这取决于二者对于本我的表达程度,若将二者比作美人,前者较清新淡抹,教人目及无遮,后者则妆容浓艳,好教人多费思量。我们很难评判孰优孰劣,因为每个读者的趣味也都有暧昧与犹疑之处。

华清作为诗人无疑是第一类。在梦里,我们的时间被分割成无数碎片,每一个线索都同时进行,像是我们修成了无数个身外化身,在经历过的、未曾经历过的每一则事件的零件里,冷眼旁观每一个好梦与噩梦,当这些化身重组到一处,便成了诗。我无意从一个诗人身上提取一个主题,教科书式的简而论之,只会固化文辞的内在冲动与丰富性,讲李白就说浪漫主义,谈杜甫就说现实主义,要是给适之先生听了去,棺材板怕是要压不住。好在我自己聚焦的词汇也属不及物,且又是无边无际的虚构,所谓“春梦了无痕”。其实春梦也是华清诗集的关键词,是其诗歌繁复的意义群中的精义所在。

在诗集《形式主义的花园》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诗人对于时间的异常敏感,这是春梦的本质属性,它也属张若虚的遗腹子,曹雪芹的无尽藏。华清刻意地、以看似不经意的放松与些许的颓废搭建着属于他自己的太虚幻境,不止是故乡的山水,城市的楼台,更有酒神节一般的露天电影(《露天电影》),记忆里如出自《聊斋志异》的眉目如画的同桌小玉(《小玉》),以及臭气熏天的歌舞升平(《时代的老虎》)、再无立场的滚滚春雷(《我不知道春雷是站在哪一边》)……当诗人枯坐于圣人临河而叹的圆座,古与今、圣与凡,都不过是形式主义的迷津,又何教子路相问呢?且看《枯坐》:

他梦见自己身体里的水
在减少。这种干枯是一个过程
现在他还有水,只是坐着,水并不发出哗然的响声

他更静下来,终于听见耳边有轰鸣的声响
那是血液的流动,经过日渐狭窄的上游
像黄河上的壶口瀑布

他看见人形的沙漏在一秒秒流逝
尘埃在空气中迅速放大
光线弱下来,但也发出奇怪的沙沙声

他听见了那塌陷无声的

中,留城还是回乡,两种观念交战于那个即将毕业的农村大学生的脑中,他最终迈出艰难而坚定的一步,在月光明明、梨花如雪的夜晚走向默默支持了他4年的乡间女友,无意中印证了传统美德的力量。

张贤亮,南台、马知遥等老作家们,共同构建了当代宁夏文学的格局,年轻一代的作家们因此而受惠并且能够顺利成长起来。与老辈作家们的现实关怀、忧患意识等有所区别的是,年轻作家们要从容得多,个体生命、现实状况和独具风貌的宁夏人文地理——古老的黄河文明,神秘的西夏遗存,以及汉、回、满、蒙古、东乡等多民族相亲共融的共同体意识,凡此种种,皆为他们文学取材的对象,涵泳其中,表现于外。石舒清以描写西海固地区民间生活的作品而为人称道,这仅是一个方面;他的视野更为宽广,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和对汉语文学那种如生命般的分外珍惜,形成了他短篇小说的审美追求:形制要短,意味须深,杜甫诗“篇终接混茫”为他所深深服膺。《逝水》《清水里的刀子》《清洁的日子》《果院》《低保》等等,即为其小说美学观念的体现。郭文斌小说则以优美的抒情笔调,于封闭、静态层面上,演绎了代表着传统中华文化的诸种节日、风俗,如春节、端午、元宵等节日以及婚嫁嫁娶等习俗,小说《大年》《吉祥如意》《开花的牙》中关于过年、丧仪等的形象化描写,令人即刻联想到汪曾祺所说风俗乃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已离开宁夏多年的陈继明,长于在从容之中体验急遽变化的社会心理,且多以题材的尖新取胜,而他对家乡人事的书写,似乎又别具一副笔墨,舒缓有致,亲切有味。

苦难意识是宁夏当代文学一个普遍性主题,然而,描写苦难不是目的,激发内在生命和追求理想方为最终的美学追求。张贤亮描写“苦难的历程”,把苦难写尽、写透,写到力透纸背的地步,以达到“本然的真实”即美丽和光明,为当代宁夏文学又开辟了一条通途。沿着这条小说美学之路,李进祥注视着各色小人物,把他们写进小说集《换水》《女人的河》以及长篇小说《孤独成双》《拯救者》《苍狗》,这些苦人儿,一如《女人的河》中坐在清水河边流泪的妇人,她的泪水融进河水中,哭累了哭够了,毅然起身,迎面生活。千年如斯的清水河知悉他们的心声和秘密,那是一种向上的力,生生不息。马金莲小说中的饥饿、贫穷、苦难主题甚至大幅渲染,可她笔下时时闪现的“1980年”这一重要关键词往往被忽略了一——日子依旧辛苦,改革的大力终究惠及乡民,他们的笑声中显示发自心底的欢快和明朗。长篇小说《马兰花开》,塑造了一个因其父嗜赌导致辍学的女孩子马兰,她慢慢化解痛苦,从人生低谷一步步攀爬而上,在生活改变她的同时她也改变着生活。马兰花,又名马蘭,抗逆性强,即是一种象征。她与张贤亮笔下“美丽圣洁”的马缨花一道,成为了文学中的姊妹人物。马金莲,这个瘦小的、一阵风便可吹倒的“80后”女作家,却以精力弥漫、才气充盈,

华清《形式主义的花园》

当肉身倒置成沙漏

□张世维

巨响,以及更深的静寂。他望见时针的骨牌
正一步步接近跳水的悬崖

他仍然坐着,坐了好大一会
他看见自己的一半慢慢倒了下去
但另一半晃了晃,最终又慢慢站起

这是一首近乎于元诗的作品,肉身与水的倒置使时间的古老母题焕然一新。2000多年前,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时的时空尚是个身外之物,花谢花飞与肉身之上仍是不同流速的时光,大千世界在转瞬之间星移斗转,而本我的禅意却端坐其中,拈起一瓣沾着尘埃的落花,这才搭起由外而内的单行道,这是典型的旧式文人处理时间母题的方式。而华清则不同,他将时间的流淌加之于自我的肉身之上,而本体之外的世界却静止不前,这转换有些像阳明先生所言,“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相较而言,阳明先生却少了内在的逝者如斯之感。每一尊肉身都已成为倒计时中的人形沙漏,每一段诗句也都在加速命运无常的流速,当流水注定走向荒漠,新鲜注定走向枯朽,那一段枯朽,竟又能唤醒一段新生,这是万物循环的奥秘,也是诗歌的命门所在。

作为一位深谙精神分析法的理论家,华清着力于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结合,偶尔却不免轻重偏颇,枝叶繁冗,敏锐的嗅觉赐予他旺盛的修辞欲望,但也令他身处逻辑与诗意的混合漩涡里。在我看来,相较于于物中之物中提炼虚构,华清更擅长从朴实的细节之中萃取出物的颓唐,如《飞蚊症》: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契约
作为不受欢迎的物体,它们强行
嵌入了我的身体,两只不明的飞行物
它将伴随且寄生于我
有限的余生
……

直到我的世界一片昏暗
这虚构的飞行物,方才湮灭于黑夜

小说集《父亲的雪》《碎媳妇》《难肠》以及长篇新著《数星星的孩子》,不倦地截取、描绘着人生诸相。同样书写苦难,季栋梁更多关注了那些进城务工的乡民尤其留守家乡的妇女老弱,他们有时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便独自跑到高高的山巅上,要么沉默地坐上一整天,要么放开嗓门儿吼上几声秦腔,长歌当哭,远望当归,然后再去重新打理生活。恰如长篇小说《上庄记》所描写的寂寞春天里兀自开放的一树桃花,生活也有着热烈的色调;又如挡山上生长着一种独有的猫蹄蹄花,根系发达,再干旱的环境里也会如小说家漠月,几十年来只写他记忆中美丽的草原,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哪怕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化解不开的苦涩,就像他的小说集名《遍地香草》,也难掩一种清新的香气。了一容,早年四处流浪,小说多取材自身放牧、淘金、打工等经历,他自述描写苦难就是为了凸显真善美;张学东,以书写儿童世界而知名,渐次将目光转向广阔的社会生活。金匮曾以描写年轻人友情及面对陌生世界极度不安的小说,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个小说美学谱系里,还可以加上一些女性作家的姓名,如韩根梅、阿舍、平原、曹海英、许艺等;亦不能忽略基层和民间的作者,比如一边打工、一边写作的马慧娟,她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积极向上,希望通过文化创造新生活的态度和决心。

张贤亮说过,他描写苦难,内含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辉和色彩,最终目的是要写出“生活的壮丽和丰富多彩”。宁夏的作家们将这作为自觉的美学追求,展现了不同的面貌和风格。

与小说实绩相比,宁夏诗歌创作于低调、沉静之中,追求汉语的纯美精粹,摇曳多姿中显得其楚楚动人。杨粹《西夏史诗》将数百年前古人一把拉到当下,拷问其蛮荒生命之下的人性;梦也则低吟着“月下/我的北方/马腹空了/马颈断了”与“大豆开花”呼喊成一片汹涌海洋,展示北方之苍凉与热烈;杨森君于智慧玄思中指点“马/比风跑得快/可/马/在风里跑”,寻常意象组合中寓含意味,深谙间离效果之三昧;林一木则在诗的现代形式中咀嚼个体焦虑,低徊不已。

深沉的家国情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苦难中积极向上的力量,多少可标示出宁夏文学的基本风格,而因身处僻远地理空间,宁夏作家因之更亲近了包括人性在内的自然,那种不期而至的、对内在生命的倾听,不吐不快,似无暇修饰,沛然而出。文学与生命一体,这又是宁夏文学的另一面。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始终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宁夏文学也始终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形成引人瞩目的“西海固文学”现象、宁夏文学现象,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景致。

走进新时代,宁夏文学事业也必将走进新的春天,取得新的进步,呈现出新的风景。

记者:20世纪80年代,叙事学引入我国,曾经流行了短暂时间,但很快被文化主义的浪潮所淹没,学人以谈文化为时尚而很少有人谈叙事学了。您为什么要选此“冷门”,重新来研究叙事学?研究叙事学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实践有何意义?

王彬:叙事学在未产生之前,小说研究依附于诗学或者美学。叙事学诞生以后,小说研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且由此向外扩展到史学、影视、摄像等艺术门类。什么叫叙事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叙事现象的学科。叙事学产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80年代引进到我国,曾经热过一段时间,很快被文化主义的浪潮淹没了。

叙事学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前者研究小说叙事规律,后者研究小说的文化语境,就此而言叙事学其实已经与文化主义合流。叙事学虽然不再显赫,但是小说依旧存在,而且小说的叙事方法也依旧在发展,因此叙事学依旧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对小说研究依旧离不开叙事学。而且由于叙事学的重点是对小说文本的分析,迄今为止,叙事学还是最为恰当的工具。当下学者做文学批评时,往往超越叙事分析直接谈文化意义,忽略了叙事层面的技术性的规律,从而难免流于学术空疏。

记者:叙事学作为一种从西方舶来的学术理论,您如何做到西方理论同本土话语的融合?同时在理论上有哪些建构和提升?您的叙事学研究主要有哪些理论创新?有何特点?

王彬:用叙事学研究中国本土小说,比较与西方小说的共性与殊性,必须做大量古今中外的文本分析,这是一个非常烦琐、艰苦的工作。为此我收获了不少新的理解,譬如叙事集团、叙事者解构、第二叙事者、动力元、变异话语、亚自由直接话语、漫溢话语等等。我认为叙事者是作家创造的第一个人物,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小说中其他人物都是叙事者的衍生物。因此小说的形态变化均源于叙事者,叙事者的形态变化决定了小说的形态变化。叙事者可以解构为叙事集团,叙事者的背后可以出现第二叙事者,从而造成叙事分层与意义多元。动力元是小说前进的动力,动力元形态决定小说形态。小说话语是对生活话语的变异,由此出现了语感问题。所谓语感有这样几个层次:词语选择、词语组合、句型与声律中的平仄关系。从话语角度考虑,小说由两种话语构成:来源于叙述者的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也就是转述语、转述语有四种形式:直接话语、间接话语、自由直接话语、自由间接话语。自由直接话语属于内心独白,此外衍生出一种亚自由直接话语——“他说,我明天一定去。”亚自由直接话语在当下我国小说中大面积出现,是中国小说与域外小说在形制上的一个重要区别。在小说中,话语是故事的载体,话语为故事服务,但是,话语不应该只是为故事服务,简而言之,故事也应该为话语服务,当故事为话语服务时,话语便出现漫溢。考察小说艺术形态的一个重要标识便是看话语的漫溢程度。

记者:五四之后,我国主流文坛全盘西化,传统文学被边缘化了,而您的叙事学研究特别注重叙事学的本土化,注重从我们的传统文学入手,从中梳理理论经验,您为何用舶来的理论来整合我们传统文学的叙事经验?

王彬:五四以后,中国主流文坛在艺术形式上完全采取西方样式,传统文学被边缘化了,而研究中国小说的特色,不得不向前寻找,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寻找中西小说在叙事规律上的同异。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小说与西方小说在起源和本质上大有不同。西方小说是虚构的故事,中国的小说是道理,是大道中的小道,属于道听途说的市井杂谈。原点不同在形制上自然也不同,因此研究中国小说的叙事规律有必要回到本土的历史深处,这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应该指出,以叙事学为工具,研究中国小说叙述现象与叙事规律,可以梳理出许多独特的叙事经验。

记者:很多叙事学研究都是从西方或当代的现代派小说入手,而您则另辟蹊径,从《红楼梦》《水浒传》入手,您有何考虑?

王彬:研究叙事学的途径各有不同,比如俄国的普立普从西方民间故事入手,分析其中的基本模式,从而构成叙事学的一个重要元素。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小说与西方无论是在本源,还是在历史的形制上,都有着显著区别。由于五四以后小说的西体化,因此分析中国小说的叙事特色只能向后看,而《红楼梦》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经典,以此做研究的底本自然会事半功倍,为此我在1998年出版了一部《红楼梦叙事》,用叙事学的方法把《红楼梦》条分缕析地梳理了一遍,总结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些叙事经验,比如时间满贯,比如动力元、比如残缺话语等等。同时也解决了用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小说的作者,究竟是曹雪芹一人还是曹雪芹与高鹗两人创作的问题等等。就叙事学而言,传统与现代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就文本分析而言是没有区别的,厘清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叙事规律,小说的起源与发展之间的脉絡,共性与殊性是极其重要的。

记者:您特别注重回到传统文化,您认为应该如何面对之前的文学遗产,如何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生发出更大的光彩?

王彬:传统文化是当下文化的根,小说创作也是如此,在形态上,可以是西体,但在内容与文化上则还应该是本土的,否则我们写小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潜意识的不知不觉中,历史的文化影响其实对作家是十分深刻的,比如马原的小说《虚构》,作者马原化身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是使用汉字写作的作家。作为先锋派小说,这样的叙事方法当时颇为轰动。其实早在200多年以前,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已经将作者化身为小说中一个人物,一个参与编辑与传播《红楼梦》的编辑人,古今相通,却被她我们忽略了。再如,亚自由直接话语之类的残缺转述语,在《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以及“三言两拍”中多有出现,而且可以上溯到《论语》,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文化现象。总之,中国的传统文化至今仍然默默地为当下小说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与动力。

记者:您的理论著作不同于一般理论文章那样晦涩难读、信屈聱牙,而是用语简练,深入浅出,同时结合了大量的实例,读起来引人入胜,充满了趣味性和灵动感,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语言风格?

王彬:文学研究应该是多元化的,写作文本也应该多元化的,每个研究者的兴趣、阅历、学养不同,写作的方式也不同。我认为来认为理论著作也是给读者阅读的,也要讲究审美、讲究灵动与趣味,让理论拥有更多的读者是我一以贯之的追求,以生动的文本阐述枯燥的理论其实是很难的,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记者:您长期在鲁迅文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身处当代文学现场,有着丰富的文学实践,对于当下文学的思潮和现象有及时的捕捉和把握,同时您也长期从事文学评论工作,那么,您的研究同学院式的理论研究有何不同?

王彬:我向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在我的研究范围,除了叙事学,还有中国传统与北京文化研究。在北京文化研究中,我提出了微观地理构想,以此为指导,我参与了北京不少历史遗迹保护与城市规划,比如北京第一条胡同——砖塔胡同的保护以及奥林匹克体育公园的规划,我认为学者研究理论应该为实践提供方向而不应束之高阁。叙事学研究也是如此,要从小说创作出发而立足文本分析,总结叙事经验,从而为创作实践提出某种可资借鉴的指向。我不喜欢空头理论,也不喜欢生活活剥式的外国理论的粗糙研究,把一种理论介绍给别人,总要自己首先弄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可取的,对域外文学理论不应亦步亦趋,而应使其本土化,并使之丰富、发展,这才是当今中国学者应当为之努力的。

记者:您花费多年时间研究叙事学,板凳坐得十年冷,这是否可以看作是您对当下文学评论的一种态度,就是回到文本研究,回到文本细读,回到深入严谨扎实的治学,而不是做空头文学评论家?

王彬:我从80年代开始研究叙事学,1997年出版了《水浒的酒店》,1998年出版了《红楼梦叙事》,2015年出版了《无边的风月》,2017年出版了《从文本到叙事》四部专著。其中《红楼梦叙事》《从文本到叙事》属于经典叙事学,《水浒的酒店》与《无边的风月》属于后经典叙事学。前者以《水浒传》中的酒店为研究对象,就酒店与文学、酒店与历史文化的对应关系做了认真分析,把《水浒传》中的酒店作为研究对象,自《水浒传》问世以后还是第一次。这本书出版以后触发了不少酒店以“水浒酒店”为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无边的风月》研究《红楼梦》的历史语境,梳理了《红楼梦》中的建筑、服饰、器物、官职、经济、阶级、语言、丧仪、人物年龄等,将原本清晰但被历史遮蔽的语境重新发掘出来,从而烛照人物幽曲,展现了《红楼梦》的真实意旨。这是十分费力的跨界研究,需要刻苦钻研与文化积累。在当下,做文学研究,泛泛的研究是不够的,只有单一的文学知识也是不够的,应该有多种学科的专业性积累,对研究者来说或者是一件应该为之努力的事情。这当然是我的不足为训的见解,很难说具有普遍意义。

□本报记者 李墨波

王彬：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叙事学研究